



聚焦与错位：唐宋人视野中的开元、天宝*

丁俊

摘要：唐人对于开元、天宝大致有三种定位。一种是从整体上肯定开元、天宝都是天下“太平”，尤其强调天宝后期在经济与国势等方面达到“极盛”；一种是仅肯定开元年间；另一种则认为，姚崇、宋璟任相时期就已经实现了“天下大治”，对开元中后期以及天宝时期都持批判态度。“开元之治”是宋人的概括，源自唐人的第三种观念。本文认为，唐玄宗在位时期包含“治世”与“盛世”两个阶段。前者是指开元前期，“贞观之风，一朝复振”；后者是指唐朝进入全盛阶段，始于开元十八年，终于天宝末。其中的最佳状态是在开元二十五年制度改革完成之后，故曰“开元盛世”。

关键词：开元之治；开元盛世；唐宋史料

中图分类号：K24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2)02-0101-08

开元、天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时段，也是唐史研究的重大课题，学界对此已有诸多论述。吕思勉先生认为，玄宗用姚崇、宋璟，“获致一时之治”^{[1]152-159}。汪篔先生、吴宗国先生认为：“开元八年、九年，政局稳定，生产发展，唐王朝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出现了‘家给人足，人无苦窳（原引文为“窳”），四夷来同，海内晏然’的局面，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开元之治’。”^{[2]293-294}这个观点影响深远^①。岑仲勉先生对此表示怀疑，曰开元之治号称隆盛，论者多归功于姚宋，然两人执政各不过三年有奇，窃以为还有其它的“偶然性”存在，那就是边境的安宁^{[3]197-198}。吴先生后来提出了新的认识，认为开元初属于“开元之治的形成”，开元、天宝“历来被看作中国古代的黄金盛世”^{[4]155-183}。这其中包含了“治世”与“盛世”两个概念。钱穆先生把赞誉的时间点放在了开元末，曰“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唐室全盛。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唐中衰”^②。

韩振军与张帆也使用“开元盛世”的概念，只不过前者认为时间在“开元后半期到天宝年间”，后者则定位在“开元时期和天宝前期”^③。乌廷玉与胡如雷属于另一种划分，将“开元之治”截止于开元二十四年（736年）李林甫任中书令之前^④。欧美学者放弃使用“治世”或“盛世”的概念。崔瑞德认为，姚崇、宋璟时代距离鼎盛期还有十年甚至更长的发展期。他把玄宗朝分为前期、中期、后期三个阶段。美国学者陆威仪的观点也大致如此^⑤。王小甫的观点则属于一个综合性杂糅。他分别认同姚宋时代、开元时代与开元天宝时代，并且融合了治世与盛世两个概念^{[5]167-176}。本文现就此问题试析。

一、唐宋史料中的三种划分

开元、天宝共44年。唐玄宗曾自述“何尝不乾乾惕励，勤念苍生”，“聿来四纪，人亦小康”^{[6]卷八六.957}。

收稿日期：2021-05-0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唐代开元天宝时期财政状况研究”（18YJC77000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校科研项目“出土文献与唐代西州财政状况研究”（XJEDU2017RS030）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丁俊，女，历史学博士，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山西太原 030006），主要从事隋唐史研究。

也就是说,他个人认为,他在位的40余年间皆达到了“小康”状态,仅次于“大同”的理想社会模式。当时的部分唐人也是把开元、天宝作为一个整体来赞誉的。

元结在天宝十二载(753年)中进士^{[7]卷一四三,4682}。他讲道:“开元、天宝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太仓委积,陈腐不可校量。”^{[8]2286}其中“高山绝壑,耒耜亦满”虽略有夸张,但是元结强调公私粮储与土地耕垦方面的盛况,是合乎实际的。杜佑生于开元二十三年(735年)^{[9]18-19},他在《通典》中有着明确的记载。其一,关于户口。天宝十四载,管户891万,口5292万,“此国家之极盛也”,并注曰,实际人口至少有1300百万、1400百万户^{[10]卷七,153,157}。《唐会要》与《资治通鉴》记载,天宝十三载(754年),管户907万户,但是同样注云:“有唐户口之盛,极于此。”^⑥换言之,唐朝的户口数在天宝末达到最高点。其二,关于粮食储备。《通典》记载,天宝八载(749年),“天下诸色米”共计9000多万石,又论曰:“昔我国家之全盛也,约计岁之恒赋,钱谷布帛五千余万,经费之外,常积羡余。”这里的“岁之恒赋”就来自天宝七载(748年)至天宝十四载的年度计账^{[10]291-294,110-111}。说明唐朝在天宝后期达到“全盛”,且国家财力持续富余。《资治通鉴》卷二一六亦曰:天宝八载,“州县殷富,仓库积粟帛,动以万计”^{[11]7012}。关于耕地面积。杜佑估计,天宝末,在籍田约620余万顷^{[10]卷六,110}。汪篔认为,实际耕地面积在850万顷左右^⑦。从以上各经济指标来看,唐朝在天宝后期达到“极盛”或“全盛”。

另外,从疆域与国势来看,也是以天宝末为盛。《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天宝十一载(752年),“唐土东至安东府,西至安西府,南至日南郡,北至单于府。南北如前汉之盛,东则不及,西则过之”^{[12]1393}。这是把天宝十一载作为唐朝疆域的定型或最佳时期。《新唐书·地理志》的说法也大略相同^{[7]960}。《资治通鉴》记载:天宝十二载,哥舒翰收回九曲部落,“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11]7038}。这说明唐朝在西域的形势臻于全盛^{[13]165-174}。

总之,从经济与军事两方面来看,天宝后期堪称“极盛”“全盛”或“盛强”。若是从社会治理

的角度来衡量,开元、天宝两个时段也都处于“天下太平”“四海晏然”的理想状态。沈既济在《词科论》中讲道:

开元、天宝之中,上承高祖太宗之遗烈,下继四圣理平之化,贤人在朝,良将在边。家给户足,人无苦窳,四夷来同,海内晏然……百余年间,生育长养,不知金鼓之声、烽燧之光,以至於老。故太平君子,唯门调户选,征文射策,以取禄位。^{[8]4868}

沈既济认为,唐朝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到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已经达到了“四夷来同,海内晏然”的理想状态。杜佑在《通典》卷一五中引用了沈既济的言论^{[10]357-358},说明他赞同沈既济的观点。

宪宗元和元年(806年),白居易对太宗之世与玄宗之世进行过一个长时段的对比。曰:“太宗以神武之姿,拨天下之乱;玄宗以圣文之德,致天下之肥。”“虽成康、文景之理,无以出于此矣。”^{[6]7486}白居易认为,太宗与玄宗的治绩,要超越“成康之治”与“文景之治”。太宗“拨天下之乱”,玄宗“致天下之肥”。所谓“拨乱”与“致肥”,可谓是“治世”与“盛世”的显著特征。

武宗时期,出现了年号与时间段不相符的治世表述。会昌五年(845年),群臣请加尊号,曰:“开元中,玄宗经始清宫,崇追玄祖,阐释道要,遂臻治平,六合晏然,四十余年。”^{[6]178}句首曰“开元中”,末尾却云“四十余年”,显然是指开元、天宝两个时段。这反映了时人在现实描述中肯定开元、天宝,但是在时间定位上则突出开元,避谈天宝。这种情形当始于杜甫。杜甫在开元末至天宝末,曾居住于长安与洛阳^{[14]11-15}。其诗《忆昔》(二)前半段云: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廩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百余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14]1161-1166}

杜甫认为,开元时期堪称“全盛日”,但是他避开了天宝。大约是诗的后半段着重描写安史之乱的“乱离”状况,这是一种文学上的对比,但是后人很重视他对于“全盛日”的具体描绘。概言

之，就是人口众多、经济繁荣、社会和谐、天下安定、制度完善。其中经济依然是重要指标。杜甫的现象叙述与沈既济、杜佑、白居易等人并无二致，但是在时段界定上却忽略了天宝。也许是出于对天宝骤变所产生的强烈哀痛，进而对天宝时期所取得的诸多成就采取模糊处理，属于一种隐晦地回避。

晚唐时期，李庾在《赋东都》中曰：“开元太平，海波不惊。乃驾神都，东人夸荣。时则辚辚其车，殷殷其徒。行者不赧，衣食委衢。”“同轨同文，昼呼夜欢。”^{[8]7648}李庾赞扬当时天下太平，社会治安良好，商业繁荣。这种状况其实一直延续到天宝，此处仅以“开元”蔽之，可谓与杜甫是同样的思路，或者说是部分唐人的共同选择。

这种表述方式发展到五代时期撰修《旧唐书》，就产生了直接对应的错位效果。《旧唐书·玄宗本纪下》史臣部分曰：

我开元之有天下也，纠之以典刑，明之以礼乐……贞观之风，一朝复振。于斯时也，烽燧不惊，华戎同轨……垂髻之倪，皆知礼让……年逾三纪，可谓太平……自天宝已还，小人道长……故禄山之徒，得行其伪。^{[12]236-237}

这里的“年逾三纪，可谓太平”，就是仅涵盖开元时期，对于天宝则正面否定，认为“小人道长”，以至于安禄山作乱。这种直接将“太平”与开元相对，全然摒弃天宝的叙史方式，也并非空穴来风。它源于唐人的另一种极端的观点。

柳芳同样生活于天宝时代，但是他的观点却截然不同。其《食货论》曰：

初，玄宗以雄武之才再开唐统，贤臣左右，威自在已。姚崇、宋璟、苏颋等，皆以骨鲠大臣镇以清静……四夷来寇，驱之而已，百姓富饶，税之而已。继以张嘉贞、张说，守而勿失。自后赋役顿重，豪猾兼并……是时也，天子方欲因士马之众……慨然有制御夷狄之心。然惧士旅之不供，流佣之未复……宇文融揣摩上旨，款开谒见，天子前席而见之，恨得之晚……融死且十余年，始用韦坚，及崇礼、慎矜，皆以计利兴功，中人主疑，胁权相灭，为天下笑。而王锷、杨国忠，威震海内，尤为暴横。^{[15]3907}

柳芳的重点在于对财政使职的批判。他指出，宇文融、杨慎矜、韦坚、王锷、杨国忠等人，违背了开元初的“清静”政策，“欲竭人财，乘主之欲”，结果是“上心荡而益奢，人怨结而成祸”^{[16]1701}。其主旨在于，财政使职的聚敛导致了安史之乱，因此，将宇文融等人归结于“奸臣”。这大概是唐人当中较早对兴利与开边的批判。更重要的是，柳芳由于不赞同对于财政使职的重用，便认为此前的姚崇、宋璟时期为玄宗朝的最佳时期，并达到了少有边事、百姓富饶的良好状态。这属于逆向思维。事实上，姚崇、宋璟时期并未达到理想状态。开元九年（721年），唐玄宗打算在蒲州置中都，韩覃上表曰：“顷年已来，水旱不节，天下虚竭，兆庶困穷。户口逃散，流离艰苦。”“东北有不宾之寇，西凉有丧失之军，干戈岁增，疆场骚动。”^{[15]3218-3219}可见，至少在国家富足、百姓安定、边境安宁等方面，开元前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柳芳对财政使职的强烈批判，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对于唐玄宗本人的定调的迎合。天宝十五载（756年），玄宗在幸蜀之后表示，安禄山“负信背恩”，“皆朕不明之过”，杨国忠“厚敛害时，已肆诸原野”，“安禄山乱常构祸，尚逋其斧钺”^{[6]957}。唐玄宗把自己定位为“用人之误”，他没有披露安史之乱的深层原因，而只是强调自己误信了“凶党”安禄山与“奸臣”杨国忠。安禄山作为乱臣，“尚逋其斧钺”，死后的杨国忠便被拿来平息时议，他的罪名就是“厚敛害时”。柳芳的言论，可以说是对杨国忠“厚敛害时”的完整解释，并且把“奸臣”的范围扩大到宇文融、韦坚、王锷等财政使臣。他的《食货论》，本质上是对唐玄宗的“用人失误”说的附和与阐发。

宪宗时期，柳芳的言论似乎占据了舆论主流。刘轸指出，当时“属文驾说之士，每议及国朝相府间事，言贞观则房、魏，言开元则姚、宋”。刘轸表示疑惑：“自贞观数十岁至开元中间，岂无房、魏之相邪？自开元数十岁至于今中间，岂无姚、宋之相邪？”然而，他也没能找到最终的答案，只是顺应时人的认知模式，总结出姚、宋两人的执政特点，曰：

姚之为相也，先有司，罢冗职，修旧法，

百官各尽其才……故曰姚善应变,所以成天下之务。宋之为相也……善守文,所以持天下之正。由是四十年间,威振四海,教加百姓,政归有司,绮縠罗纨之家,请谒不行,而戚里束手矣。故生于开元、天宝之间,自幼迨强仕,女有家,男有室,耳不闻钲鼓,目不识兵革。故玄宗无为,恭事玄默而已。^⑧

刘轲的叙述,等于为柳芳的观点做了进一步解释,即由于姚崇、宋璟执政的成功,才使得开元、天宝时期出现了“治世”或“盛世”景象。不过,刘轲的疑惑提醒我们,开元、天宝之盛与它的源头或者真正缔造者之间出现了断层。其干扰源可能就来自玄宗与柳芳等人的论断。除此之外,还有宪宗朝对于玄宗朝的治乱反思与盖棺定论。

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李绹与崔群。李绹指出,玄宗即位之初,“任姚崇、宋璟,二人皆忠鲠上才”,玄宗“亦励精听纳”,因此“内外宁谧”。开元二十年(732年)之后,“李林甫、杨国忠相继用事”,“奸臣说以兴利,武夫说以开边”,以至于“天下骚动”^{[12]4288}。可见,李绹延续的是柳芳的思路,只不过,他否定的是李林甫任中书令之后的宰相政治。于是,在承担历史罪责的行列中,除了杨国忠,又加入了前任宰相李林甫。这其中有玄宗、肃宗、代宗时期的种种铺垫。稍后,崔群也强调“小人祸国论”,并指出“人皆以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为乱之始,臣独以为开元二十四年罢张九龄相,专任李林甫,此理乱之所分也。愿陛下以开元初为法,以天宝末为戒”^{[11]7895}。崔群的言论,是为了反对“聚敛之臣”皇甫镈为相。其原因可能是政见不同,也可能是为了政治斗争。崔群为了强化自己的说服力,把皇甫镈与李林甫、杨国忠等人一同归于小人进行批判,其中未必经过周详考虑与客观分析。但是,这个言论把关于玄宗朝的反思又推进了一步,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以开元初为法,以天宝末为戒”。

这种把开元初与天宝末截然对立的观点,发展到晚唐,就演变为“开元初”即“治世”的表述。郑繁在《开天传信记》中讲道:

开元初,上励精理道,铲革讹弊,不六

七年,天下大治,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安西诸国,悉平为郡县,自开远门西行,亘地万余里,入河湟之赋税。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较。四方丰稔,百姓殷富,管户一千余万,米一斗三四文。丁壮之人,不识兵器。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其瑞叠应,重译麇至,人情欣欣然,感登岱告成之事。^⑨

郑繁认为,姚崇、宋璟执政的六七年间,就已经实现了天下大治。这个观点基本上被宋人所继承。范祖禹在《唐鉴》中讲道:“明皇既相姚崇而委任之,如此其能致开元之治,不亦宜哉。”^{[17]111}这应该是唐宋史料中第一次完整地出现“开元之治”四个字,而且与姚崇相对应。司马光也认为:“姚、宋相继为相,崇善应变成务,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11]6843-6844}可见,司马光融合了柳芳、刘轲、崔群、郑繁等人的观点。北宋末年的王谠也在《唐语林》中转录了郑繁的言论^{[18]309}。从此,姚崇、宋璟便成为“开元之治”的代表人物,“开元之治”也被聚焦在开元前10年。此后清人的认识,不过是承袭唐宋人的观点而已^{[19]686}。

综上所述,唐宋时期,对于开元、天宝的认识存在三种不同的定位。第一种,从整体上肯定开元、天宝,认为当时“四海晏然”、天下太平,尤其是天宝后期达到了“极盛”或“全盛”。这种观点以元结、杜佑、沈既济、白居易等人为代表。第二种,在事实描述上认同开元、天宝,时间定位上却突出开元,避谈天宝,甚至将“太平”之世与开元“三纪”进行简单的对应。以杜甫、李庾以及《旧唐书》的编纂者为代表。第三种,从现实政治的角度出发,或出于统治者的舆论定位,或出于政见不同,或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或囿于成论,逐步否定开元中后期至天宝末的漫长时段,并且延伸出姚、宋时代即“开元之治”的主观定论。这个过程缘起于唐玄宗、柳芳,经过肃宗、代宗时期的铺垫,到宪宗朝经由李绹、刘轲、崔群等人的演绎,初步形成定论,最终经过郑繁、范祖禹、司马光、王谠等人的推进,成为影响深远的主流观点。

二、《通典》《新唐书》与《开天传信记》等史料中的杂糅与错位

根据以上分析，杜佑等人对于开元、天宝的定位应当是较为客观的，但是即便如此，《通典》当中也存在一些描述上的混乱。卷七载：

初，自贞观以后，太宗励精为理，至八年、九年，频至丰稔，米斗四五钱……武太后、孝和朝……农功虚费，府库空竭矣……至十三年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齐谷斗至五文。自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匹二百一十二文。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二十年，户七百八十六万一千二百三十六……自十三载以后……因渐减耗……十四载……此国家之极盛也。^{[10]149-152}

杜佑的叙述主线是户口，认为自贞观之后，发展良好。武则天、中宗时期，财政状况落入低谷，“府库空竭”。到开元十三年（735年）才开始好转，此后似乎进入“盛世”阶段，其细节描述截至开元二十年。天宝十三载渐有“减耗”，十四载达到“极盛”。这种长线条的勾勒大致不误，但是关于开元十三年至开元二十年间的叙述却存在杂糅与错乱。

据《旧唐书》卷九记载：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其时频岁丰稔，京师米斛不满二百，天下义安，虽行万里不持兵刃”^{[12]213}。《南部新书》与《册府元龟》也有记载：“开元二十八年，天下无事，海内雄富。行者虽适万里，不持寸刃，不赍一钱。”^⑩《资治通鉴》曰：是岁（开元二十八年），“西京、东都米斛直钱不满二百，绢匹亦如之”^{[11]6963}。可见，物价维持在一斛米、一匹绢皆在二百文左右，“海内雄富”，社会治安良好，行万里不持寸刃的状况，是在开元二十八年左右。《通典》还提到“驿驴”的盛行，说明交通便利与商业繁荣，其实也是在开元末^{[6]1776}。杜佑显然是把开元二十八年、开元二十九年间的繁荣景象错置于开元

十三年至开元二十年之间。

《新唐书·食货志》同样如此。曰：“是时，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天下岁入之物，租钱二百余万缗，粟千九百八十余万斛，庸、调绢七百万匹，布千三十五万余端。”^{[7]1346}这里的“海内富实”如前所述是对开元末的描写。米斗十三钱、青齐间三钱，是开元十三年的状况^⑪，但是“绢一匹钱二百”是在开元末。可见，物价略有上涨。下一句仍然是指开元末的状态。至于“天下岁入”部分，是来自《通典》中天宝“七载至十四载”的计账。其中“租钱”指户税，“粟”的收入包括正租与地税，这些数字与庸调收入，完全与《通典》中的记载相一致^{[10]110}。换言之，《新唐书》所罗列的内容，表面上看似始于开元十三年，实际上却集中在开元末至天宝后期。如果我们把起首的“是时”理解为开元十三年，那么整段叙述就存在名实不符的错位现象。

再比较郑紫的《开天传信记》。郑紫认为，开元六年（718年）、开元七年（719年）就已经达到了“天下大治”，然而他后面所展现的内容，却与开元初全无关系。其中“安西诸国，悉平为郡县，自开远门西行，亘地万余里”，是指天宝十二载的情形^{[11]7038}。“入河湟之赋税”，大概来自《东城老父传》^⑫。“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较”，与天宝八载的情况相吻合^{[11]7012}。“百姓殷富”“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等叙述，乃开元末年的盛况。“管户一千余万”，是杜佑估计的天宝末的实际户数。至于“丁壮之人，不识兵器”，也是在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实行募兵制之后才会出现的情形。《唐六典》卷五在叙述新兵制时，便畅想“是后，州郡之间永无征发之役矣”^{[20]156-157}。《资治通鉴》与《唐会要》也记载，天宝末，“海内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识兵革”，“人至老不闻战声”^⑬。可见，这诸多细节仍然是体现在开元后期至天宝末的，甚至更集中于天宝后期。郑紫把它们作为姚、宋时期实现“天下大治”的证据，显然是不合逻辑的。尤其是最后提到“人情欣欣然，感登岱告成之事”，好似落脚点又回到开元十三年的封禅盛典。这种错位式的囊括，实在是值得

严正辨析。

上述史料把开元末至天宝后期的繁荣景象,错误地框架在开元六年、开元七年至开元十三年之间,或者开元十三年至开元二十年之间,体现了一种杂糅与错乱的同时,也反映了一种纠结之感。这种纠结的源头,大概就是因为自宪宗朝之后,士人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开元二十四年为“理乱之分”的既有概念。在这种认识前提下,开元末与天宝年间的繁荣便人为地割裂或淹埋,至少在时间标签上不能明示。《通典》的作者也经历了肃宗、代宗时期,多少会在观念上留下一些痕迹。《开天传信记》与《新唐书》等史料出现得更晚,受到的现实干扰因素更多,因而出现名实不符、内容杂糅、时间错位、逻辑关系倒置等诸多现象。

三、错位后的再聚焦

通过以上梳理,可知学界关于开元、天宝的主要观点,大多来自唐宋史料中的不同论述。而唐宋史料中的记叙,也多有聚焦上的失焦与错位。以下重新检视开元、天宝时代,冀求获得新的认识。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治世”与“盛世”两个概念,今人并没有超越白居易的认识。白居易认为,“治世”的特性在于“拨乱”,“盛世”的特性在于“致肥”。学界的观点也大致如此,即前者的重点是政治清明,后者主要标准是社会经济与文化的繁荣^④。马卫东指出,“治世”与“盛世”存在相续性^[21]。也就是说,“盛世”往往是在“治世”的基础上实现的,这个观点具有一定的揭示意义。

《旧唐书》卷九载:开元时期“贞观之风,一朝复振”^{[12] 236-237}。也就是说,开元时期包含了“治世”的恢复阶段。玄宗即位之初,杨相如就历数了武则天以来出现的诸多问题,包括“兵革数动”“日费滋多”,营建寺观、官吏侵渔,“国储不足,人蓄久空”,因此,他希望玄宗能够“效太宗去邪佞之士,进忠贤之人”,减少造作、徭役等不急之费,“兢兢业业,以致太平”^{[6] 6074-6076}。玄宗应该是听从了这个建议。姚崇任相之后,消除弊政,安定政局,恢复生产^{[4] 160-162}。宋璟继任之

后,也是以节制为主。经过姚、宋两人的努力,国家的治理逐渐从混乱走向制度化。从这个角度而言,开元前期同样具有“拨乱”的效用,即“贞观之风,一朝复振”。开元十年(722年),玄宗下敕,“侍中源乾曜、中书令张嘉贞、兵部尚书张说等忠诚辅弼,以致升平”,为了“褒德赏功”,“令宰相共食实封三百户”^{[16] 1076}。这大概是玄宗朝最早的“升平”局面的形成,其中包含了前任宰相姚崇、宋璟等人的努力成果在内。

但是,这一时期仍然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开元九年,宇文融开始括户。开元十一年(723年),张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力图将使职系统纳入宰相的管辖之下^⑤。降胡不稳也是急需解决的一个边境问题。进入开元中期之后,宰相之间出现了明确的分工,通常是一位主经济,一位主军事,这种分工与朝廷所面临的问题是一致的。如李元纁以“堪为户部”而入相,宇文融以“治财赋得幸于上”,杜暹主持西北边事,萧嵩解决与吐蕃的征战。在这个阶段,玄宗是以政事需求而择相,整个国家的治理在初显“升平”的基础上继续上升。直到开元十八年(730年),出现了另一番景象。本文以为,开元十八年标志着玄宗朝开始迈向盛世阶段。具体表现如下:

其一,社会治安良好。开元十八年,“天下奏死罪止二十四人”。次年,宰相裴光庭、萧嵩奏曰,“昔者断狱数百,文、景称仁,征诸良史”,“请宣付史官”^{[6] 卷五八, 620}。裴光庭等人认为,开元十八年、开元十九年的状况堪比“文景之治”,甚至超乎其上,因此请求载入史册。开元二十五年,又奏曰,“今岁天下断死刑五十八”,“百官以几致刑措,上表称贺”^{[11] 6911, 6950}。可见,社会治安良好的状态在持续。

其二,经济状况明显好转。开元十八年,由于“户口日殷”,改定州县等第之限。上州加一万户,以四万户为限,中州加五千户,以二万五千户为限,上县、中县也各加一千户^{[16] 1457}。这意味着国家在籍人口的大量增加,也意味着国家财政收入的大幅增长。开元十八年正月敕曰:“百官不须入朝,听寻胜游宴,卫尉供帐,太常奏集,光禄造食。”此后三四年间,每至春末暇日,皆令群臣选胜地游乐,费用由皇帝与相关部门

承担。直至天宝末年,依然有类似的记载^⑥。这种长期性的鼓励官员假日游赏并由政府出资的举措,充分体现了国家财政的富足状态。

其三,文化昌盛。开元十九年(731年),“集贤院四库书,总八万九千卷”。至天宝十四载,“续写书又一万六千八百三十二卷”^⑦。开元二十年,萧嵩等奏上《开元新礼》^{[16]248}。此时,《唐六典》的修撰已历经10年,这部官修典籍的意义绝不仅限于“文饰太平”,而是整个唐前期制度的总结^{[22]7-13}。这些都是礼乐文明与制度完善的具体展现。

其四,第二轮制度调整的开启^{[4]172}。开元十八年,裴光庭实施循资格。同年,裴耀卿提出漕运改革计划,并在开元二十一年(733年)获得实施。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李林甫对冗官进行减省,随后相继对官制、俸禄制度、选举制度、赋税制度、军事制度以及法律制度等进行改革。最终成果纳入开元二十五年新修定的律令格式。这标志着第二阶段的制度改革整体完成。

从开元十八年到开元二十五年整体制度改革的完成,这标志着玄宗朝正式进入“盛世”阶段。

在此基础之上,玄宗君臣便将战略眼光转向了边疆问题。开元二十六年(738年),由于吐蕃的侵扰,唐朝与吐蕃进入全面对抗状态^{[23]287-297}。唐玄宗令宰相双双遥领节度使。中书令李林甫遥领陇右、河西节度使,侍中牛仙客遥领朔方、河东节度使^⑧。两位宰相遥领四大节度,这在唐前期绝无仅有。它标志着宰相制度的新变化,也标志着朝廷重心的转移。从此,军功成为一种快速进取的途径,李适之与杨国忠都是以此入相。杨国忠更是身兼多种财政使职,又遥领节度使,他与安禄山都力争夺取李林甫的中书令之位,就预示了武人政治可能到来。除此之外,天宝后期在达到“极盛”的同时,也出现了各种激烈的权争,这体现的是一种制度上的困境与政治上的失序。这种制度上的困境,大概到了宋代才通过普遍分权的方式得以解决,但是在当时就成为瓦解盛世或者制约盛世持续发展的败坏因素。安史之乱既是一种政治格局的崩溃,也是一种新的政治体制演进的开始。我们不能因为盛世所面临的制度困境以及它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就否定盛世本身的意义。开元、天

宝时代,以它在各个方面的辉煌成就以及阶梯式上升,证明了它是超越之前各个时段的整体繁荣的“盛世”。

结 语

唐玄宗在位的40余年间,包含“治世”与“盛世”两个阶段。严格来说,姚崇、宋璟时代并未达到最佳状态,但长远来看,它承担着一个桥梁的作用,就是“贞观之风,一朝复振”,具备“拨乱”的“治世”特征。开元十八年至开元二十五年整体制度改革完成,标志着唐朝正式进入盛世阶段。史料中关于盛世景象的诸多描述,便集中于这个时段之后。天宝末,唐朝在经济与国势等方面达到了“极盛”或“全盛”。盛唐所代表的高度,集中体现在开元十八年至天宝末这个时段,故称“开天盛世”或“开元、天宝盛世”。

注释

- ①类似观点包括: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38页;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42页;宫崎市定撰,焦堃、瞿柘如译:《中国史》,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65页;气贺泽保规撰,石晓军译:《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1页。②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387页。类似的观点还有:李树桐:《开元盛世之研究》,收入《唐史研究》,台湾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93-160页。③韩振军:《略论宇文融的“括户”及其对“开元盛世”的作用》,《内蒙古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张帆:《中国古代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8-159页。④乌廷玉:《论唐玄宗和“开元之治”》,《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1期;胡如雷:《唐“开元之治”时期的宰相政治探微》,《历史研究》1994年第1期。⑤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40-341页;陆威仪撰,张晓东、冯世明译:《世界性的帝国:唐朝》,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34-35页。⑥《唐会要》卷八四《户口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837页;《资治通鉴》卷二一七,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7048页。⑦汪钱:《唐代实际耕地面积——隋唐史杂记之四》,《光明日报》1962年10月24日,收入《汪钱汉唐史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2-73页。⑧姚铉编:《唐文粹》卷七九《再上崔相公书》,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44册,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另据《全唐诗》卷四九一《刘轸小传》,刘轸于元和末登进士

第。⑨郑綮:《开元传信记》,收入王仁裕等撰,丁如明辑校:《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据其按语,郑綮卒于唐昭宗光化二年。⑩钱易撰,黄寿成点校:《南部新书》卷丙,中华书局2002年版;《册府元龟》卷五八《帝王部·致治》。⑪《通典》卷七《食货七》;《资治通鉴》卷二一二,开元十三年。⑫陈鸿:《东城老父传》,收入李昉等编,张国风会校:《太平广记》,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年版。⑬《资治通鉴》卷二一七;《唐会要》卷七二《军杂录》。⑭胡如雷:《唐“开元之治”时期的宰相政治探微》,《历史研究》1994年第1期;刘后滨:《从贞观之治看中国古代政治传统中的治世与盛世》,《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⑮吴宗国:《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9-170页。⑯《册府元龟》卷一一〇《帝王部·宴享第二》;《唐会要》卷二九《追赏》。⑰《唐会要》卷三五《经籍》;卷六四《史馆下》。⑱《资治通鉴》卷二一四;《旧唐书》卷九《玄宗本纪下》。

参考文献

- [1]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 [2] 翦伯赞.中国史纲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2006.
- [3] 岑仲勉.隋唐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4] 吴宗国.隋唐五代简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 [5] 王小甫.隋唐五代史:世界帝国开明开放[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
- [6] 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M].南京:

- 凤凰出版社,2006.
- [7]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8] 董诰.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2.
- [9] 李之勤.杜佑年谱新编[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4.
- [10] 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8.
- [11]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012.
- [12] 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13] 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 [14] 仇兆鳌.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
- [15] 李昉.文苑英华[M].北京:中华书局,1966.
- [16] 王溥.唐会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 [17] 范祖禹撰,白林鹏,陆三强校注.唐鉴[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
- [18] 王谟撰.周勋初校证.唐语林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8.
- [19] 王夫之撰.舒士彦点校.读通鉴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3.
- [20] 李林甫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M].北京:中华书局,1992.
- [21] 马卫东.中国古代三大治世的历史成因[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5):29-34.
- [22] 吴宗国主编.盛唐政治制度研究:绪论[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
- [23] 林冠群.玉帛干戈:唐蕃关系史研究[M].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6.

Focus and Dislocation: Kaiyuan and Tianbao in the Vision of People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Ding Jun

Abstract: There were three different views on the Kaiyuan and Tianbao in the Tang people. The first was praising the whole Kaiyuan and Tianbao eras as peace time, and emphasizing the extremely prosperity of the later Tianbao period. The second was only praising the Kaiyuan era. The third view regarded that well-governance were achieved when Yao Chong and Song Jing were prime ministers, while the mid and late period of Kaiyuan and total Tianbao era were denied. The word “well-governance of Kaiyuan”(开元之治) appeared in Song dynasty, and developed from the third point.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ang Xuanzong’s era contained both well-governed period(治世) and prosperous period(盛世). The former refers to the early Kaiyuan era which reappeared the features of “well-governance of Zhen guan”. the latter refers to the stage which began at the 18th year of Kaiyuan, ended in the last stage of Tianbao. The peak time appeared since the 25th year of Kaiyuan when system reforms were finally completed. So, we call it “prosperous age of Kaitian”.

Key words: well-governance of Kaiyuan; prosperous age of Kaiyuan; historical material of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责任编辑/周舟]